

读《聊斋志异》 漫想走笔

章敬一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读《聊斋志异》 漫想走笔

章敬一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聊斋志异》漫想走笔 / 章敬一著. —天津 :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310-05508-1

I. ①读… II. ①章… III. ①《聊斋志异》—小说研
究 IV. ①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86987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刘立松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昌黎县佳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230×160 毫米 16 开本 12.5 印张 3 插页 118 千字

定价:46.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如果您有机会打开这本书，首先，请接受作者的问候，并诚挚地希望您，耐心将它读完，让我们进行一次心灵的交流。

序

我国古典小说正式成为一种文学体裁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代产生了一大批小说作品，或曰志怪，或曰志人。尤其志怪小说，空前繁荣，如干宝的《搜神记》、张华的《博物志》、刘义庆的《幽明录》、东阳无疑的《齐谐记》、王嘉与萧绮的《拾遗记》、颜之推的《冤魂志》以及托名作品《神异经》《列异传》《汉武帝故事》等。至唐代，小说家承袭志怪传统并予以创新发展，古典文言小说走进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涌现出大批唐传奇优秀作品，诸如初唐时的《古镜记》《游仙窟》、盛中唐的《离魂记》《枕中记》《南柯太守传》《柳毅传》《李娃传》《莺莺传》《长恨歌传》、晚唐的《虬髯客传》《红线传》等脍炙人口的名家力作。宋、元、明时代，此一文体的创作虽无突破性发展，但亦承延不断，时有佳作问世。直至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全面继承志怪小说和唐传奇小说的传统，把古典文言小说的创作推向了顶峰。《聊斋志异》

一经问世，迅速“风行天下，万口传诵”，“无论名会之区，即僻陋十室，靡不家置一册”。

我亦蒲翁信徒之一，案头常置《聊斋志异》一卷，把玩咀嚼，兴致经久不衰。今年樱笋时节，无锡章敬一先生将其《读〈聊斋志异〉漫想走笔》书稿惠赐于我，并嘱我为之作序，着实让我既高兴又惶恐。高兴的是能得先生大作先睹为快，不胜欣慰之至；惶恐的是我于蒲翁《聊斋志异》仅只是喜欢诵读而已，素无深究，当此大任，实犯褚小绠短之忌，甚恐有负先生重托，更忧贻笑方家。况且，先生乃我最崇拜的授业恩师，立雪犹恐不及，岂敢造次弄斧。再三谢辞，先生坚持不许，为感先生谦逊亮节，只得勉为其难，权当像当年在恩师执鞭讲台之下一样，诚惶诚恐，给恩师交上一份漏洞百出的作业吧。

翻开书稿，首先给我深刻印象的是题目——《读〈聊斋志异〉漫想走笔》。一个“漫”字和一个“走”字，为书评内容设置并开拓一个广袤的空间。我从大学读书期间就开始古典文学评论的尝试，毕业后留校执教古典文学，业余期间一直在此领域笔耕不辍，今拜读先生的书稿，始知自己评论的手法过于拘泥传统，追求的格式过于四平八稳。而先生融杂感随笔手法于常规书论之中，特意选择这一别开生面的评论形式。一者，拓宽自己驰骛八极的思路，让自己在由《聊斋志异》而引发的任何领域、任何话题的范围中均可随意涉猎、自由想象。二者，这一形式赋予书稿无比丰腴的知识含量和

无限深刻的认知内涵，整个书稿就时间跨度而言，从蒲翁生活的清初到现代和当代，前后三百余年；就笔锋触及的社会领域而言，或封建皇权，或妇女权益，或传统习俗，或爱情婚姻，或性爱文化，或反贪刺贪，或国内外时政，几乎包罗万象；就涉及的文学其他作品而言，有短篇，有长篇，有中国文学作品，有外国文学作品；就涉及的人物而言，古今中外，或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庶蒸民，或上至国家元首下至普通百姓，皆有论及，阅读之余，会让读者大开眼界，受益无穷。三者，先生采取这一评论形式，更为重要的目的是由《聊斋志异》的内容及蒲翁的身世际遇和创作思想，生发开去，再现先生作为一个 20 世纪 40 年代初出生的老知识分子的积极心态和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的拳拳之衷。这一点也许是先生最为注重并追求的“醉翁之意”。

这一良苦用心也正是先生书稿的第二大亮点，也是全书的精髓和核心所在。

蒲松龄在他的《聊斋志异·自序》中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此一段表白，道出了《聊斋志异》的创作初衷，也是后人阅读和评论《聊斋志异》的纲要。敬一先生敏锐地抓住其中两个关键词语：“孤愤”和“寄托”，一方面，仔细梳理原著中的作品，条分缕析，知人论世，挖掘作品的深刻内涵。把三百多年前身处封建时代末期的知识分子坎坷蹭蹬的遭遇和黑暗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既精辟地再现和批判了清初这

个表面兴盛骨子里却是封建社会强弩之末的危机四伏的时代中存在的种种社会污浊现象，又准确地再现蒲松龄内心的痛苦和性格的矛盾：他极端不满现实，对贪官恶吏深恶痛绝，予以无情批判与鞭挞，但对统治者又存有一定幻想，他曾满怀怨愤地说：“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与韩刺史椒依书》）；他同情人民疾苦，“感于民情，则怆恻欲泣，利与害非所计及也”（《与韩刺史椒依书》）。但又像孔乙己那样始终脱不下长衫，永远跳不出贱视劳苦大众的封建知识分子偏见的藩篱；他既有朴素的唯物论思想，但又宣扬佛教因果轮回等宿命观点，甚至自以为是“病瘠瞿昙”再世；他既痛恨八股，讽刺科举，但又不忘追求功名。他自十九岁起应童子试，县、府、道皆获第一，此后科场不顺，屡试屡败，直到去世前五年即年届七十时还为应试名落孙山而悲痛欲绝：“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大江东去·寄王如水》）；他赞扬真情，歌颂爱情自由，但又不得不接受和赞同一夫多妻制度；他同情女性，歌颂和倡导男女平等，但却无法跳出性别歧视、男尊女卑的窠臼。先生评论中紧紧抓住蒲松龄思想极度矛盾下“斗酒难消块垒愁”（蒲松龄《感愤》）的“孤愤”展开笔墨，可谓切中肯綮。

另一方面，先生的评论笔触没有单纯停留在评判作品思想内容上，而是借蒲松龄的遭遇和蒲松龄笔下描述的社会万象，把自己由衷的心曲深深地“寄托”在书稿之中。先生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初，襁褓之中就经历了日本法西斯铁蹄

践踏我国大好河山的苦难岁月，并见证了日寇投降和蒋家王朝的覆灭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此后，先生成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古老民族涅槃新生后的第一批幸运少年，在幸福的阳光下以优异成绩修完高中学业，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培养下，直接走进高校的神圣殿堂。毕业后分配在苏北一所中学任教。先后经历过 1957 年的整风“反右”运动、社教和给我们祖国建设带来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等风风雨雨。20 世纪 80 年代初调回原籍无锡在政府部门任职，直至退休。先生亲身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走过的曲折历程，和常人一样，个人的生活经历也不乏不尽人意的遭际，但是，读过《聊斋志异》和先生的书稿后，我们会发现，蒲松龄和先生这二位相隔三百年的新旧知识分子有着完全不同的心态。蒲翁穷愁潦倒，面对现实，显得那么无奈而又无助，慨叹自己如“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聊斋·自序》）。只能借助鬼狐故事，抒发满腹牢骚、一腔孤愤，也仅只是代表封建末期失意文人宣泄的一种情绪而已。而先生书稿中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时代老知识分子“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拳拳之衷。而先生走过的人生历程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和初期建设的时代，面对我们党从马上得天下而迅速转向马下治天下的探索中的得失与成败，先生在书稿中立言显得那么理智，那么宽容，那么真诚！他在书稿的“后语”中这样写道：“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之路不是平坦的，因为前无古人，摸着石头过河，少不了困难与曲折。如社会

主义改造急于求成、经济建设搞违背客观规律的赶超和大跃进、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搞政治斗争，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等，以致出现了如‘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十年浩劫，给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重大的损失。但这些问题都是在前进过程中出现的，而不是为了个人或小组的利益。因此，中国共产党人能不断地总结与反思，勇于发现问题，统一认识，改正错误；勇于改革创新，找到了一条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具有鲜明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保证了中国这艘巨轮乘风破浪不断向前……六十年过去了，尽管反华浪潮此起彼伏，抹黑、丑化中国的手段层出不穷，但中国不仅没有被压垮，反而通过自身的艰苦努力，让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十三四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与落后，实实在在过上了小康生活。”就个人身份而言，先生仅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和基层干部而已，但是，面对我们伟大祖国在治国与经济建设道路上的曲折历程，先生这种宽厚与包容心态，表现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一代知识分子令人钦佩的宽广襟怀和让人尊重的深沉涵养！也许书稿问世之后，有读者读到“后语”这段文字时会感觉有离题蛇足之嫌，但细细咀嚼，我们会发现先生这段文字的良苦用心。先生在“后语”标题下给出一个副标题：三百年后的人们会如何看待和评价我们这一代。并这样写道：“纵观历史，正是大量有知识者，能先于人领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在社会领袖、栋梁之材与劳苦大众之间担当着桥梁与纽带，起着宣传教育、

团结组织广大民众的作用，推动着社会与历史向前。因此，甚至可以说，一个时代知识阶层的整体面貌如何，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这一时代的命运。清代诗人龚自珍诗中哀叹的‘万马齐喑究可哀’的社会现状，早年的《聊斋志异》不是已有充分反映了吗？正是预示着清王朝必然垮台的命运。因此，芸芸众生之中小知识分子的绵薄之力亦是不可缺少的。”“知先生者莫若弟子也”。读了这段话，我们会发现“后语”不仅没有离题，而是先生在阅读《聊斋志异》，从清朝的历史教训和认识以蒲松龄所代表的中下层知识分子思想以后的深刻的“漫想走笔”，是在用一个平凡知识分子的无比热忱而正直的良知诉说自己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事业、热爱生活的心声。这段语重心长、情真意切的感悟，不仅表达出老一代知识分子纯真无邪的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也是我们后世读书人足以引为楷模的正能量。

另外，书稿中的另一个亮点是对《聊斋志异》中妇女形象的评论。性别歧视、男尊女卑这是两千多年来封建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教条，作为生活在那个时代中的蒲松龄，尽管在作品中用了为数可观的篇章表现对女性追求自由爱情与向往婚姻幸福的同情和赞扬，对叛逆女性的歌颂，但那也仅只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出于不满现实而产生的不自觉的朦胧觉悟而已，所以在表露这种觉悟的同时，永远无法摆脱封建传统的束缚而跳出性别歧视的窠臼。先生这一方面的评论中没有把笔墨停留在人们经常注意的肯定蒲翁进步的妇女观这一层面

上,而是刻意把目光聚焦在作品中有关妇女问题的消极层面,把作品中种种歧视女性的现象罗列出来,加以评述。

初读书稿,我以为先生似乎有点挑刺,后细细品味,尤其是先生在评论中深情款款地提到他母亲旧社会当童养媳的不幸遭遇和用电视连续剧《胡杨女人》的主角斯琴形象与作品中的妇女形象进行对照分析,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先生有感于两千多年来中国妇女在封建传统桎梏束缚下不幸命运,而真情萌动。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逾一个甲子,但是,性别歧视下男尊女卑的现象并未彻底消除。先生敏锐地发现,从三百多年前的封建社会末期,到封建统治制度被推翻的民国时代,再到那个几乎是完美的东方女性而实质上逆来顺受的胡杨女人斯琴所生活的现代社会,女性是男性社会的附庸这一不平等陋习依然清晰如故。所以,先生选择这一点不仅仅是在评说蒲松龄妇女观矛盾的一个侧面,更为注重的是对整个封建宗法制度下男女不平等陋习中妇女命运的深深同情,同时,对封建政权和制度虽被推翻的今天性别歧视、男女不平等的封建遗留陋习却仍然像魔鬼一样阴魂不散而表示深深忧虑。由此可知,先生笔触从这一切入点着墨,不仅仅是出于新颖角度的选择的考虑,更主要的是对男尊女卑的不平等制度的讨伐、对男女平权的呼吁和对中国伟大女性的深深同情与无比诚挚的尊重。当然,先生在强调这一点的同时,也不忘呼吁女性在寻求解放的同时也要注重增强自身的自强自尊自重意识。书稿从《聊斋志异》中刻画的矛盾的妇女形

象，诸如《侠女》篇中的“年轻貌美，冷艳自重”杀凶为父报仇、自强独立、单纯复仇的侠女形象漫想走笔，联想到《金瓶梅》中与西门庆有染的众多女性，书稿十分沉痛地指出：“这些女子从根本上看，都是受害者，有让人同情的一面，却都是甘心为奴，逆来顺受，没有一点抗争意识；且穿绫戴金，吃喝玩乐，争艳斗宠，十分享受西门庆巧取豪夺掠来的财富供养的奢靡生活。”书稿中还提到美国的明星梦露，先生对梦露的人生悲剧结局表示“尽管她是那样的令人同情”，但“她自己十分欣赏别人对她垂涎欲滴，再加上对权势的依附与顺从，使她在相当程度上迷失了自己。其实她的这种使人发狂的性感，是表象的，肤浅的，缺乏内涵的，华丽外表下真正缺少的是一颗坚强的内心，一种以自尊自重自爱为核心、追求真善美和情爱性和谐统一的优秀女性的品质。”先生敏锐地认识到，消除性别歧视的封建余毒，女性自身的自尊自重、自强自爱也是绝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性爱与情爱问题本是一个古老而又常谈常新的话题，健康的性行为本是人类之间传达情爱的正常行为活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孟老夫子就用一句简明扼要的大实话作了概括：“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即性爱就像人需要吃饭一样是一种本能的需求。《聊斋志异》中有大量涉及此话题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先生在书稿中有意引导读者阅读和借鉴古今中外四部小说：《金瓶梅》《废都》《白鹿原》《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尽管衍述著作故事情节的笔墨略冗，但却有助于

我们把《聊斋志异》所反映的性文化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性文化的表现对比思考，从而更清楚更正确地认识人类的这一有别于动物的文明活动，更能深入了解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这一活动上的形式的丰富性和习惯的多样性，从而摈弃低俗，选择文明。

记得先生十分感慨地跟我说过，他 20 世纪 70 年代服从组织安排改行从政后心中一直流连苏北执教的那段生活，那任他挥舞教鞭的三尺讲台，那讲台下一个个活泼可爱的学子，那一页页字迹工整的讲稿，还有那执教之余尽情在书海中徜徉的图书阅览场所等，常常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诗经·隰桑》）。先生退休赋闲以后，这种怀旧情感与日俱增，东隅已逝，桑榆非晚。他情不自禁地重新捧起书本，《读〈聊斋志异〉漫想走笔》书稿正是在这样背景下产生的。如今先生已近杖朝之年，但尚如此“壮心不已”，追求不息，何等难能可贵！实令吾辈后学汗颜。

行文至此，总算完成先生布置的作业，但心中甚为忐忑，这挂一漏万的胡乱猜测、妄评非议，也算是“序”么？权当引玉之砖吧。恳望先生见谅，也望读者包涵。

沈立东

二〇一六年樱笋时节于鹤舞斋

（沈立东，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中国农学会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会员，江苏省红学会会员，江苏省杂文协会会员）

前言：喜欢《聊斋志异》的理由

《聊斋志异》是我国清代一部集志怪作品大成的短篇小说集。闻世以来，关注它的人就颇多，作序跋题词的，注释评论的，传抄刻印的，单从由张友鹤先生辑校，1963年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三会本”（会校、会注、会评）《聊斋志异》所汇集的早期资料看，就可称蔚为大观了；而近代（清以后）研究它的专家、学者以及爱好者的文字资料想来更多。

笔者阅读不广，识见有限，粗浅的理解是：前人对蒲松龄，叹息其怀才不遇，赞扬其孤愤明志，充分肯定《聊斋志异》惩恶扬善、有功名教的主旨。在这类文字中，与作者同时代又是山东老乡的渔洋老人王士禛（别号渔洋山人）的四句诗“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不同凡响，表面上未作褒贬，但寓意深刻，感觉上沉甸甸的。

近人评述早见的有鲁迅先生，写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小说史略》说到《聊斋志异》，就有“花妖狐魅，多具人性，读者耳目，为之一新”之句；郭沫若先生题蒲松龄故居的对联“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为人称颂。应该说到的还有一代伟人毛泽东同志，晚年深爱《聊斋志异》，据有关书籍介绍，在他的书房、卧室、游泳池旁的休息室内，都放着多种版本的《聊斋志异》，他的名言是：“《聊斋志异》可以当清朝的史料看。”阅读中，他不仅对《马介甫》《席方平》《细侯》《小谢》等多篇作品写了批注，而且根据 20 世纪 50 年代末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形势，反击反华大合唱的需要，从《妖术》篇中于公不怕鬼、战胜鬼的故事得到启发，提议编选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后与具体负责选编的中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著名诗人何其芳多次交谈，并亲自修改该书序言。《不怕鬼的故事》1961 年 2 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成为思想战线上的一件利器，也可称古为今用的一个范例。近来也有文章提到邓小平同志晚年十分爱读《聊斋志异》，可惜未见具体内容，无法引述；唯读《聊斋·秀才驱怪》篇，末有“黄狸黑狸，得鼠者雄”之句，推知邓公“白猫黑猫”论，可能出典于此。最近一例选 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他也是迄今唯一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作家。莫言回忆说，最早从中学课本上读到《席方平》篇就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创作的《生死疲劳》的故事框架就是从《席方平》中学来的。有评论家认为，他也是在用这种方式向

文学先辈致敬。

至于更多研究者的评述，想来定有不少创见，较之前人，应该更为客观与具体。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铅排本 1979 年版出版说明中一段文字有所概括：“表面虽然谈狐说鬼，实际上讽刺封建社会的黑暗，揭露满族贵族集团和官场的黑暗，批判不合理的科举制度和婚姻制度……但书中也存在着一些宣传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观念和迷信色彩。”进步意义及不足都说到了。

大凡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都有超越时代、国界、社会阶层的艺术力量。但从受众的广泛性来讲，《聊斋志异》都可以与之一比。就近代中国而言，凡有一定阅读能力和喜听故事的人，很少有人不知道这部书或其中的一些人物、故事的。二三百年来，不分男女老幼，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尤其是广大读书人，读听《聊斋志异》，一如共同面对一席可供享用、各取所需、百味杂陈又回味无穷的大餐，《聊斋志异》何来如此大的吸引力？

如果以此问题做个社会调查，答案很可能是众说纷纭、五花八门的。从浏览报章便可以随手举出几例。一是当代著名女作家、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女士，2012 年 6 月随夫回东南大学参加建校 110 周年校庆活动，在与学子作“阅读与人生”讲座时，说到“文革”中偷读《聊斋志异》，“作者的想象力飞扬，我喜欢那些活泼、率真、勇敢的狐狸，为我灰色的生活开启了秘密的有趣空间。”二是江苏省发行量较大的《现代